

基于社会问题的19世纪英国中等阶级 妇女社会公益活动考察

杨帆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摘要:19世纪英国,随工业化而来的社会问题触目惊心,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国家稳定。中等阶级妇女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务实态度,主动加入了慈善和公益改良等现实行动,拓宽了社会公益事业的范围和内涵,扩大了妇女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社会问题;19世纪英国;中等阶级妇女;社会公益活动;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868(2016)04-0109-05

社会公益活动多指卫生、救济等福利事业,广义的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知识传播、社团活动等也属于这一范围。在19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前,中等阶级妇女和男子一起主动参与慈善和公益改良活动,顺应了持续兴起的城市精英社会身份认同的要求,使尚处于贵族阶层管理之下的中等阶级形成了相对一致的阶级文化,有利于英国中等阶级妇女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社会认同。

1 19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因社会结构或社会环境失调而造成的影响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正常生活的问题,即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而非个人的困扰。19世纪英国,由生产力变革而带来的社会多方面的不协调发展,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最终转化成社会问题。

1.1 贫困问题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但却忽视了社会公正,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贫困。首先,工人阶级生活环境恶劣,大多数工人居住在工厂周围的棚户区,通风、采光、卫生条件极差,噪音空气污染严重,当时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家庭挤在一个房间内生活,一家人数达10—15人。其次,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低下,以1844年对全国织袜工抽样调查为例,在154户织袜工中,每台织机平均每周收入10先令,扣除租机费后每户只有6先令或平均每人每周生活费1先令,而且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内^[1]。再次,食品质量更糟,他们吃的土豆多半质量很差,干酪是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常常是病畜肉。经济危机一旦爆发,数以万计的工人就会失业,生活更加困难。

1.2 住房问题

收稿日期:2016-05-16

基金项目:安徽省精品资源共享课《世界文化史》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gxxk086);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2BSS021)

作者简介:杨帆(1985-),女,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旅游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文化与旅游。

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原有的公共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房屋供应不足问题凸显,“在曼彻斯特,3个人睡一张床的地下室有1500个,4个人睡一张床的地下室有73个,在布里斯托尔,2800户家庭中有46%的家庭只有1间屋子”^[2]有的家庭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睡在稻草上,在利物浦,1/3家庭住在地窖里^[3]。住房空前拥挤,大量连排式、大杂院式、背靠背式房屋涌现。伦敦的贫民窟,曼彻斯特的背靠背房屋都“闻名遐迩”。

1.3 环境污染问题

不断排放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中,许多河流被污染。以泰晤士河为例,19世纪以前,河水清澈见底,是举世闻名的鲑鱼产地,水禽栖息的天然场所。随着工业革命进行,污染逐渐窒息了泰晤士河,水质恶化,病菌滋生,乃至1832—1886年,伦敦就曾4次霍乱流行,仅1849年一次就死亡14000人^[4]。恩格斯曾记录了流经利兹的艾尔河的污染状况:“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时清澈见底,流出时又黑又臭,被各式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5]煤炭等燃料的大量使用造成了大气污染和烟雾污染。“滚滚浓烟”绝非伦敦独有,而是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城市的“共同景致”。

1.4 卫生健康问题

由于缺少科学知识和缺乏利用废物的经验,人们将煤渣、烟灰、废铁、废料甚至垃圾到处乱扔,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在人口大量涌向城市时,公共卫生设施严重缺乏,政府针对这样的问题在初期也缺少管理经验。污染直接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与当时农村人口的平均寿命50岁相比,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恶劣的卫生环境成为热病、伤寒、霍乱和其它疾病的滋生源。1831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霍乱,当时从俄国蔓延而来,在英国共肆虐了37个城市,夺走了3万多条生命^[6]。

1.5 社会道德问题

人口的大量流动,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行为失范在所难免。工厂女工未婚先孕现象司空见惯,恩格斯曾记载:“‘血汗工厂’的女工、洗衣女工、女仆皆因贫穷、失业走上卖淫之路。纺织行业的无业女孩,每4人中就有3人去当妓女。”^[7]工人家庭父母把全部的性需求和性行为暴露在子女面前,粗俗污秽的语言成了他们的

家常用语,甚至连孩童也说粗言秽语。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重镇谢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最不记后果的人”为收入最低的工人,住房糟糕,品行不端^[8]。

19世纪英国贫困现象加剧,住房问题形势严峻,环境恶劣,健康存在隐患如此等等引起了中等阶级妇女的关注和忧虑,她们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改造中来,力图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2 中等阶级妇女社会公益活动

中等阶级这一概念在恩格斯那里做了详细阐述:“英文中Middle-class(或者Middle-classes),同法文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表示有产阶级,即同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7]英国史研究普遍认为19世纪英国中等阶级是一个多层次重叠的阶级,基本上都有一定财产,雇佣仆人或者帮工是他们的重要标志;他们中有大商人、企业主、银行家、大农场主以及政府官员、军官、教士、律师等,也包括店主、小贩、小业主、独立手工业主、零售商等。中等阶级妇女即指中等阶级男子的妻子或女儿们,其法律地位依附于中等阶级男子。

19世纪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与阶层发生变化,中等阶级逐步成为英国橄榄球型(“两头小,中间大”)的阶层结构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尤其随着1832年议会改革后,党派政治的专门化使得女性贵族政治的影响力逐步削弱。比起工人阶级妇女和贵族妇女,中等阶级妇女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人数最多,参与频率最高。其次,因为优越的经济条件,较高的文化水平,更多的空余时间,中等阶级妇女这一时期社会公益活动自觉主动意识较高,受到社会肯定。她们很容易参与慈善活动,而不必把它作为一种全日制工作,慈善活动已被社会中多数人接受,并成为女士角色规范的一部分^[9]。翻开历史的故纸堆,佛罗伦斯·南丁格尔、路易斯·特文宁、玛丽·卡彭特、奥克塔维亚·希尔、汉娜·莫尔、琳达·考利、艾米丽·戴维斯等等都是当时受到民众认可的社会公益女性。

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社会史研究兴起和左翼学者“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出现,19世纪英国妇女的活动受到了学者关注。之后,李·霍尔克姆和凯瑟琳·格雷德等将中等阶级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借鉴沿用这一观点,结合中等阶级妇女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所以以其为研究对象,呈管窥之见。

这一时期,她们继续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帮助穷人,又涉足公益改良事业,辅助中等阶级男子,改善社会环境。参与的过程也是中等阶级妇女日益发挥其影响和价值的过程。

2.1 参加慈善公益活动

“慈善是向穷人、有病者、年老无助者等弱势群体施舍、救济,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行为。”^[10]慈善公益活动是中等阶级妇女救助穷人的最佳办法。她们纷纷加入,并以此为荣,一时间,是否参加慈善公益竟成为衡量她们身份地位的标准。

19世纪中等阶级女慈善家们探访的对象繁杂,有小贩、报童、卖花姑娘、卖火柴者、十字街头清道夫等,更多的还是鳏寡孤独者。她们按照各自教区的实际情况开展探访活动。在小镇和乡村,中等阶级妇女独自探视穷人和病人,给他们阅读《圣经》,动员孩子上主日学校,组织缝纫俱乐部和母亲茶话会等。在稍大城镇里,她们代表所在教区和教堂,集体有组织地从事慈善公益活动。

她们向穷人施舍的资金来源多是自己的认捐资金。义卖也是慈善资金的重要来源。义卖的东西多是参加劳动的女士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1827年,科切斯特的一位银行商的私家花园里,举行了大型的义卖募捐活动,女士们为医院筹集了700英镑的济贫金^[11]。在圣诞节时,诺夫克乡村芥末商的夫人给每位雇工一块猪肉,给村庄小学每位孩子一便士^[11]。女士们还把写小册子、诗歌和小说等获得的稿酬捐给慈善事业,有些人还义务地为慈善组织绘制生日卡和圣诞卡。

她们广泛加入到社团和集会中,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网帮助穷人和残疾人丰富自己的生活,为需求者提供物质援助与精神支持。有向穷人分发了其成员缝制衣服的“沃肯顿婴儿服社团”、“布朗科特社团”、“多卡斯社团”,有帮助贫困产妇的“女士救济贫穷产妇慈善组织”、“利物浦辅助社团女士分会”等,有培训妇女和儿童,教会学员处理家务等相关事情的“母亲联盟”、“教会委员会”等。部分留下来的材料足以发现中等阶级妇女参与慈善公益、救助社会的广泛性。1835年,伦敦的“卫公理会基督教导会”派出2000名女志愿者,每月两次探访穷人,共有40000户被探访者。1843年,由伦敦主教帮助建立“首都探视和救济协会”,在1893年时,中等阶级女志愿工作者

有8.4万人。

2.2 参与公益改良活动

2.2.1 协助住房改革

对贫困人群的住房改革首先提上日程,中等阶级妇女加入到住房改革中,协助中等阶级男子。奥克塔维亚·希尔就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女住房改革家。她目睹了伦敦贫民区的肮脏、拥挤,修建了低成本、低租金的廉价实用房,租给贫困者,与房客和睦相处,帮助房客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自助意识,教育房客提高社区意识和社会责任,同时,调动各方积极因素,整顿环境,开辟公共空间,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希尔住房改革的价值在于她以私人经营的方式,融入人性化管理,帮助贫困者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弥补了国家政策和政府管理的薄弱之处。希尔改革受到广泛赞扬,并迅速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城镇地区推广,传播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茶商的女儿路易斯·特文宁发起成立了“住房探视协会”,协助住房改革。她在观察以前佣人的住所后记载:“这儿竟然是病人、穷人的混合病房”,几乎都是没有用的、陈旧的破房,几乎没有冲刷过,还有许多寄生虫和病毒。这样一个未改造的贫民住房将成为第二代穷人和妓女的诞生地,影响孩子健康成长,于是她建立了探视协会。成立之初,协会就明确了成立目的:“善待赤贫小孩和孤儿;为贫苦人和身体有缺陷者提供舒适住房。”^[12]中等阶级妇女是“住房探视协会”主要成员,她们通过组织协会的方式揭露实情,为政府改革提供数据,协助和监督政府住房改革的实施。

2.2.2 加入卫生改革

妇女的系统合作是卫生改革成功的必不可少条件。人们将卫生改革分成两方面:改善有害的外部环境;改革有缺陷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其中,前者被认为是男人的当然责任,后者主要是妇女责任。对于作为母亲、妻子和家庭教师的女士们来说,她们有必要在婴儿照料、家庭经济、家庭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卫生理念上适当改变,来顺应卫生改进的需求。正如帕特里斯·赫尼斯所言:“尽管人们将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生活的舒适归功于男子,在教育 and 规范家庭成员遵守卫生惯例等方面,男人是办不到的。”^[12]

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参加当时的卫生改革,促进了环境改善。她们组织的卫生协会很快成立,

在短短的4年内就发行了140000份小册子,宣传住房、穿着、疫苗接种和照顾孩子等内容。许多女讲师、女拜访者和流动的教会女士都宣传卫生知识,成为公共卫生健康知识的传教员和调查员,到各地监督当时工厂卫生措施的实行,促进卫生法实践。当时的全国妇女委员会为宣传卫生知识出版了一系列教育性小册子,内容大多是教会妇女注意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约克郡的女士教育委员会还特别开设了卫生保健和伦理学课程。

除直接参与到卫生改革的宣传和实际工作中外,她们也间接影响了致力于卫生改革的男性亲属。作为他们的妻子、母亲、女儿、姐妹,她们竭力地鼓励他们做好卫生改革工作,在他们泄气的时候,赞赏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正如当时杂志所评:“女士的神圣使命应该受到极大赞扬。”^[12]

2.2.3 致力居民健康

她们成立了各种妇女组织宣传卫生观念和健康知识,如母亲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普及健康和卫生知识。其中有一位长期从事于改进贫穷邻居身体素质的女士,在她笔下记录了母亲会议在教育与引导其它妇女注重健康卫生的积极意义,“母亲会议为将卫生知识传给贫困母亲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这种模式非常必要”^[12]。当时流行的许多小论文、杂文、小册子、诗歌多由中等阶级妇女写作,以此宣传让居民重视健康。

还有许多医护人员为居民健康状况担忧。1865年,南丁格尔培训学校的护士安吉斯·琼斯组织了她的许多同伴,去照顾她所居住的棚户区教养院的1300名病人,三年后自己却在照顾病人中传染伤寒去世。1879年,路易斯·特文宁女士组织了“提高棚户区专业护理质量女士协会”,用了近20年的艰辛实践培训了800名妇女从事该职业。到1897年,已经有5000名训练有素的护士和护士长为贫苦病人工作着。1874年,南丁格尔和拉斯波组建了“提供病人专业护理全国联合会”,为各个地区医院输送医护人才。

2.2.4 教化民众道德

在对贫困人群的安置中,她们着力于贫困人群的教育和精神引导。当时许多中等阶级妇女致力于为女工开办夜校的公益事业,自愿为她们服务,借以在教育界实现服务社会的愿望。1848年10月,多兰斯的夏洛特·格斯特夫人在其丈夫的

铁炼厂为女工办起了夜习班^[10]。还有许多技术类的学校都是由中上层妇女无偿创办来培训工人阶级的女工们,让她们毕业后有一个独立的谋生手段。鉴于19世纪四十年代在布林斯顿穷困学校的教学经历,玛丽·卡彭特特别关心“问题小孩”,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为“危险和濒于绝望阶级”的儿童提供帮助;针对贫民窟中的赤贫小孩建立济贫学校,针对街道中的流浪儿建立了劳工学校,针对法律上有过失的小孩建立教养院,并耐心教育他们,将他们从成年人的惩罚型教育方式中解放出来,尊重孩子,用家庭般的温暖来重塑孩子的心理。到1866年时,她已经建立了65个教养院,收容了5000多个孩子,创办了50个劳工学校,招收了2000个儿童,她还提出儿童应该和妇女一样自救自助。

同时,许多中等阶级妇女还为进入城市打工的女孩提供精神引导,防止她们道德堕落。她们还经常给乡村入城打工的女孩提供一个“代理家庭”,让她们在其中享受母亲和姐妹般的关心。凯娜德女士在理解女孩的孤独和喜爱后,在菲特兹广场成立了一个小家,收留她们;到1856年,她在伦敦设立了142个小分部,成功地为17000名女孩成立了19个代理大家庭;她还为女工提供了良好的休息和娱乐、学习场所,“女孩友善协会”、“照顾无朋友女孩女士联合会”等都为贫苦女孩提供了精神指导和生活方便。

中等阶级妇女不仅广泛参与当时的慈善公益活动,也加入到中等阶级男子改造社会的进程中,逐渐从“家庭天使”观念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更多意义的生活目标。19世纪英国中等阶级妇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有利于缓解当时尖锐的社会冲突,其社会救助和对贫困人口安置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方的社会政策思路。1868年,波切丽特女士告知《英国妇女评论》的主编,由于她的压力,林肯郡的济贫卫士已答应给济贫院外需要救济的妇女和儿童帮助。约瑟芬·格雷·巴特勒长期呼吁政府关注社会底层女性尤其妓女,最终促使英国废除了针对妓女的“传染病法”^[9]。

诚然,中等阶级妇女社会公益活动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隶属于整个中等阶级立场,有时也被认为是表达阶级地位的重要载体而受到世人评论。在社会改革的顺利实行中,卫生、环境、健

康、道德问题得到一定程度地解决,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丰富了市民文化的内涵,这体现了历史辩证发展的正能量。考察 19 世纪英国中等

阶级妇女为社会进步所作努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努力的中国女性也可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刘金源.财富与贫困的悖论——论英国工业化的失误及其原因[J].史学月刊,1999,(1):21-27.
- [2] ROSEN G.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4] MAY T.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M].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 [5]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6] WALWIN J. English urban life 1776-1851[M]. London:Hutchinson, 1984.
- [7]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8] E·罗伊派克.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9] BONNIE S, JUDITH A, ZINSSER P. A history of their own women in Europ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M].New York: Karper & Row Publishers,1989.
- [10] 王晓焰.18—19 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1] LENORE D, CATHERINE H.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class, 1780-1850[M].Lon-don: Routledge, 1987.
- [12] PATRICIA H. Women in public 1850-1900[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1981.

责任编辑:陈 凤